

“玉器时代”的国际视野与文明起源研究[※]

——唯中国人爱玉说献疑

● 叶舒宪

摘要:人类各大文明发生期都有各自的玉石信仰和神话。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文明独自经历过玉器时代的观点需要得到国际视野的修正。文明前夕率先获得神话化的玉石是西亚的黑曜石,其次是西亚北非的青金石、绿松石和东亚的地方玉及和田玉。玉石神话观不仅影响史前人的政治和文化行为,而且催生交换、贸易和财富观,成为文明起源的原动力之一。

关键词:玉器时代;黑曜石;青金石;文明起源

文章编号:1003-2568(2011)02-0031-10

中图分类号:B9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邮编 200240

2008年的北京奥运突出中国文化理念,在金银铜牌上分别镶嵌了白玉、青玉和墨玉,体现了“金玉组合”设计创意。中国人崇玉爱玉的古老传统,和源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传统,构成耀眼的“金玉良缘”式对位搭配效果,博得好评,载誉世界。

古希腊人的体育精神一度旨在培育具有战斗力的勇士群体,扩充疆域、聚敛财富。中国人的崇玉精神则彰显君子之德和礼尚往来之精神,以避免战争和暴力。这充分凝缩在中国习语“化干戈为玉帛”一句中。

一、“玉器时代”说需要国际化视野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一种新观点,认为在文明发生过程中,只有中国境内的史前先民经历过一个“玉器时代”,即介于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崇玉拜玉的历史阶段,由此构成中华文明发生的一大特色。二十几年来,相关的讨论热度不减^①。赞同者有

之,反对者有之。不过从具体研讨玉文化源流的范围看,争论双方的眼界基本上局限于国内或东亚地区。进而有学者提出“玉石之路”说^②,探讨的范围依然囿于国内。

1998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以“东亚玉器”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会上饶宗颐先生提交了论文《中国“玉”文化研究的二三问题》,强调唯独中国人爱玉的观点,指出:在印欧语系辞典中,找不到“jade”这个词,希腊文无“玉”字,“jade”是从西班牙文而来的,拉丁文作ilia。推论的结果是:“印欧语中没有玉。”为了突出中国先民对玉的独特认识,饶先生还将“玉器时代”观念的源头上溯到古代:“吾国在西方考古学方法未入华以前,很早就有人肯定中国曾经历过一度‘玉器时代’的阶段。(如《越绝书·宝剑篇》:‘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古人对玉与石的差别,辨认的智识,表现在玉石取名上,有次玉、似石、玉属、美石等等区分(见《说文·玉部》),充分说明对于‘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阶段成果。

^①争论双方的论点介绍,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36-245页。

^②孟凡人《“玉石之路”刍议》,杨伯达编《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三编下,紫禁城出版社,第616-619页。



的研究已有长远的历史和相当完满的成果。”^①

饶先生通过中西(印欧语系)对比的方式,从文化史角度认定中国人早就意识到所经历过的“玉器时代”,而印欧语中没有“玉”类词汇则表明西方文化观念中没有玉的重要地位,甚至根本不识玉。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在多数国人中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从认知人类学角度看,某一文化的语言词汇确实能够集中体现该文化的认知特色。不同文化的地理和生态条件不同,对玉石种类的辨识也自然会各有千秋。研究者不宜以本土文化对玉的认识和分类为普遍标准,去衡量和判断其他文化的情况。最好能够采用人类学研究作业的“内部视角”,具体地体认每一个文化所特有的玉石观念。换言之,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玉石或宝石观念。查验《牛津拉丁语辞典》,拉丁文 *ilia* 并没有玉的意思,它或指身体的部位,或指罗马建国神话中英雄慕洛斯和瑞摩斯的母亲名字^②。古希腊文中虽没有一个等同于汉语“玉”的总名,却存在着一批指代具体玉石美石的词汇。如 *κυάνος(kuanos)* 一词,既指“深蓝色彩釉”,又指青金石。^③在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希腊英雄的盾牌和铠甲上,这种模仿青金石的深蓝色彩釉被当作神物镶嵌在金属之上。从技术起源上看,希腊人是从埃及借来的这项工艺。因为天然的玉石青金石本身具有深蓝颜色,而人工制作出的蓝色釉(或称“珧琅”)就是最早在古埃及为满足替代青金石的现实需求而发明的。至于解答古埃及人为什么要发明能够替代青金石的深蓝色彩釉的问题,则需要认识埃及文明受到苏美尔文明的青金石神话观影响的情况:苏美尔人将青金石的蓝色类比于天和天神,不惜用珍贵的生活必需品——粮食,到遥远的中亚地区去换取修筑神庙所需要的青金石。由此看,玉石神话观是早期文明所共有的信仰现象,而不是哪一个文明所特有的。中国人的“玉器时代”说若要成立,国际性的比较视野是必不可少的知

识条件。需要首先解决的疑问是:难道世界的其他古文明都没有经历过铜器时代之前的玉器时代吗?

本文认为,在不了解世界主要文明的玉石崇拜及其神话的前提下,对中华文明发生的认识思路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容易导致片面的立论,助长文化自大感。刘勰《文心雕龙》所批评的一种认识上的自闭现象,就叫做“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为此,有必要对世界主要文明古国的玉石神话观有一种全局性的认识,较为全面地把握世界性的玉石崇拜及相关神话情况。

美国考古学理论家伊恩·霍德等《阅读过去》一书讨论到史前墓葬中出现玉斧的文化含义,表明玉制斧头虽然不像石斧那样普遍,也还算是各地文物中较常见的。“斧可能是介于斧的埋藏地点和玉料来源之间跨地区贸易的指标,也可能是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情境的指标,因此能指代墓葬中的躯体和其他的随葬品,引出器物的特定的、历史的环境性的情境。由于形式上的近似,玉斧也可能是同一个地区实用斧头的图标。最终,玉斧能够成为身份的标志,标志物和标志对象则可能是任意的。这样,一个符号就有了多种含义。”^④

在考古学家柴尔德给出的界定一个考古学文化所需的内涵清单中,盐、琥珀和玉被列入工业的“其他原料”项之下。^⑤可见玉作为古老的加工材料,在史前考古发掘中并非罕见之物,而是常见之物,甚至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各地的零星发现。

审视世界最早的文明起源地区——西亚和北非的玉石崇拜神话及其文化传播作用,可以说明文明发生期的玉石崇拜现象不但不是华夏独有,反而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值得做深入的比较研究(图1)。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处在文明门槛之前的人类群体,如何从对各类美石、宝石、矿石的认识、崇拜和开发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催生对金属矿石可熔铸性的新认识,从而开启自石器时代向

①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第一册,第17页。

②Oxford Latin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825.

③Henry George Liddell & Robert Scott (ed.),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04.

④伊恩·霍德等《阅读过去》,徐坚译,岳麓书社,2005年,第54页。

⑤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01页。



图1 苏美尔的尼普尔城出土玉雕人像,公元前2800年。解释为神庙中祭神者

青铜时代过渡的大门。换言之,新石器时代末期极为发达的玉石神话观念,对于青铜时代的发生具有驱动力的作用。具体来看,从公元前八千年的黑曜石神话到公元前三千年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的青金石和绿松石神话,足以揭示玉石崇拜及相关的神话观

念,如何伴随着自农业起源到文明起源的五千年全过程,并支配着早期文明人的信仰、思想和行为,驱动着跨国跨地区的远距离贸易和文化交流传播,直接推动着人类进入文明

的脚步。直到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积累,才揭示出如下事实:人类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极度崇拜的青金石,还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神话化之玉石种类。黑曜石才是首当其冲的神话化石头,与它伴随共生的是农耕文化的起源。相对而言,黑曜石成为追求和交换的对象,比伴随着人类最早的文明城邦起源的青金石要早数千年。中国人提出的“玉器时代”说,只有还原到世界文明发生的这种大背景中,才能打破见木不见林的封闭局面,获得知识全球化的整体性学术评估新契机。玉器能够在东亚的青铜器流行之前构成一个“时代”的标志物,必有其观念形态的原因,这方面的研究除了借助考古学,同时也需要求助于比较神话学。

笔者曾提出“玉教”的概念,作为史前中国信仰的国教。依照韦伯式的论证方式(基督教新教伦理可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唯独发生在西欧),不仅需要说明为什么华夏先民在将玉石信奉为神灵或天赐圣物,从而形成一种“玉教”神话,还需要说明为什么其他古文

明没有产生或流传类似的“玉教”伦理。实际上,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古文明而言,玉石崇拜及其神话不是没有产生过,而是伴随着这些古文明的覆灭或衰微而失传于后世,不像中国人爱玉崇玉观念与行为那样贯穿于整个文明史展开过程,直到今天还为我们所熟知。

从考古发掘给出的线索看,玉石崇拜和玉石神话是人类进化的数百万年漫漫征程临到自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和转化之际,伴随着阶级社会的萌生、王权与财富观念的形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拜物教思想观念及神幻想象叙事,它逐渐占据了史前宗教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给后世文化发展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玉石神话毫无例外地突出表现在旧大陆(欧亚非)的八大文明古国(按时间排序,依次为苏美尔、埃及、阿卡德和巴比伦、印度、中国、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迈锡尼和希腊、希伯来)的发生期,并与巫术(法术)和驱邪、图腾崇拜、万物有灵等早期信仰相结合,形成各大文明中最基本的文化编码原型及文学想象原型。

限于地理的和自然资源的条件,各大文明所崇拜的玉石种类有所不同。在上述八大文明古国中,玉石崇拜现象皆以同一种石头为最初的源头和基础,那就是黑曜石。由于文化交往和传播的影响作用,八大文明中有七大文明的玉石崇拜种类相同或相近,如金玉共生,玉石以青金石为主,兼及绿松石、玛瑙和水晶等;唯有一个文明的玉石崇拜呈现出明显的与众不同之特殊性,那就是中华文明,从非中原的周边地区之地方玉石崇拜,演化为中原王朝对来自新疆的和田美玉之崇拜。从国际性的比较文明大视野重申“玉器时代”说,有以下四点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华夏传统中金玉崇拜的非共生性:东亚先民认识矿石的历程,是先玉石(公元前6000年)而后金属(公元前2000年);玉石神话的发生早于金属神话约四千年。换言之,中国青铜时代以来的历史约有四千年的传统;而中国玉文化的历史则是八千年之久,其时间足足多出一倍。西亚、中亚和欧洲的古文明发生期经历过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紧接着黑曜石神话而来的是金属矿石和青金石、绿松石的同时圣化。



第二,华夏金属崇拜中铜为最早的圣物,黄金白银为后起的圣物。二者都可能受到西亚和中亚文明的传播影响而逐步进入中原文明。其自西向东传播的路线与新疆昆仑山和田玉输送中原的路线,在时间和空间上大体上是重合的。因而形成了金玉互动而催生东亚文明的重要现象。

第三,中国玉石崇拜史以中原以外地区的地方玉崇拜现象开始,以中原文明的和田玉崇拜为终(至今依然如此)。从时间看,这一个崇拜玉种的转换过程,大体上和文明起源过程同步。也就是说,大约在夏商周三代建构中原文明政权的时期,用了大约一千年时间,开启并完成新疆和田玉成为中原王权神圣象征物的历程。从地理空间看,在唯一出产和田美玉的新疆昆仑山和河南安阳之间划一条连线,就可以大体上暗示出中华文明发生期最重要的文化交往与传播互动的大通道。

第四,中国文化中之所以没有青金石神话,原因在于本土矿产中没有发现其资源。位于昆仑山西侧的阿富汗山区特产的优等青金石矿藏,为什么能够在文明发生期不胫而走,向西传遍了中亚、西亚、南亚、古埃及乃至整个地中海区域,却偏偏“春风不渡玉门关”,没有及时传入东亚和中原,直到汉代以后才少量输入呢?

二、黑曜石神话:文明前夕的“疯狂石头”

认为只有中国人才崇玉爱玉,这是时下很流行的观念。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曾经同样盛行玉石崇拜的世界早期文明古国大都没有将其文化传统延续下来,其当初的玉石神话和观念也就随着古国的灭亡而沉寂于后世(图2)。但是唯有中国人崇玉的说法毕竟无法得到国际学术视野的检验,有必要从根源上加以澄清。着眼于全球文明史的大视野,应该说,人类在走出漫长的石器时代,迎接文明时代来临之际,大都经历过一个崇拜和酷爱某些美丽玉石的历史阶段。黑曜石(obsidian)是人类先民发现所有玉石宝石之前最先认识到的美石或圣石。这是一种来自火山喷发的黑色半透明火山岩。因为其坚硬程度足以胜任优等的石器工具制作的原材

料,黑曜石终于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被率先筛选出来,成为万千石器中出类拔萃的一类,并被赋予魔力魔法之类的神话观念色彩。20世纪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新石器革命”的理论倡导者戈登·柴尔德就非常精辟地指出,文明发生期的不同文化群落之间开始日渐频繁的贸易往来,是以某些特殊的石头为主要对象

的。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意味着冶金术的开端。柴尔德针对古埃及文明的情况写道:“新石器时代的埃及村落里,见有来自红海和地中海的贝壳。在较晚的埃及墓葬里,除了有孔雀石和松香外,后来还有天青石和黑曜石;再往后又见到了紫水晶和绿松石,而且数量不断增加。孔雀石很可能产自西奈或努比亚东部的沙漠;松香出自叙利亚或阿拉伯南部森林覆盖的山区;黑曜石来自爱琴海的米洛斯岛、阿拉伯、亚美尼亚,或许还有埃塞俄比亚;天青石则可能产自伊朗高原。”^①柴尔德随后讲到苏美尔文明的类似情况:“在苏美尔,在最古老的聚落里黑曜石和天青石的珠子共生,后者也许是来自印度甚至是亚美尼亚。在叙利亚北部和亚述,黑曜石的引入像苏美尔一样早,天青石与绿松石随之现身。”柴尔德注意到的这些玉石材料,在西文中通常称作宝石或半宝石,分明体现着玉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形成的“珍宝”和财富观念。其中的天青石(lapis lazuli)又译为“青金石”,后者是更为准确的译名。在西亚和北非,此类玉石先于金属而出现在文明前夜的社会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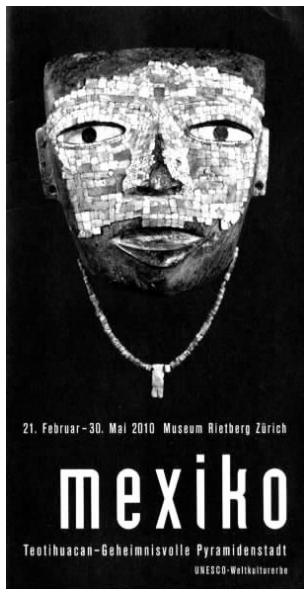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瑞士博物馆举办墨西哥古文明展广告 绿松石与红玛瑙镶嵌的神面具 眼球为黑曜石

①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86页。



中,其年代和东亚人崇奉各种地方玉石的时代基本相当。这就表明欧亚非大陆在玉石神话信仰方面的多样性表现形式,其中既有较为特殊的孔雀石和和田玉(产地的唯一性),也有较为普遍的黑曜石、青金石、绿松石、玛瑙、水晶、红宝石、蓝宝石、光玉髓(肉红石髓, carnelian)、猫眼、琥珀等。广义的玉石或玉概念,按照《说文解字》的“石之美”定义,应是包括所有这些美石在内的。从现代中国地质学的创始人章鸿钊在1921年出版《石雅》^①一书,到今日的宝石学和玉学的专家著述,大都普遍认同这种广义的玉石观。^②

考古材料表明,黑曜石在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区率先成为史前贸易的重要对象,并由此而开启了人类不同社会群落之间的贸易往来的先河,给社会交往扩大条件下的文明起源,奠定了原初性的多元文化基础。西亚地区约旦河流域的纳图芬(Natufian)文化早在公元前1万年就处于繁荣期,并持续到公元前8000年。纳图芬文化形成一个以杰里科(Jericho)为中心的定居点,修筑起宏大的城防设施,并以黑曜石原料为主要交换对象而发展出广泛的贸易。这显然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定居生活人群和最早的远距离商品贸易。由此可知,虽然在人类最早的古文明中黑曜石与青金石具有“共生”关系,但是从更加古老的史前文化背景看,唯有黑曜石率先充当着人类历史上“疯狂的石头”角色。对此,国际学界已经大致形成某种共识。如美国人类学家约翰·佩佛《人类的诞生》一书认为,麦种和黑曜石成为第一批跨地区贸易的农耕文化对象,从西亚近东地区向西面和北面扩展开来,最后终结了欧洲人以狩猎维生的主要生活方式。^③英国雷丁大学的史前学教授斯蒂文·梅森在《冰河期之后:全球人类史20000—5000BC》书中指出:“谷种显然是新石器时代贸易网络中的特色产物,这一贸易网络从土耳其延伸到约旦河谷的南部。我们

知道这种贸易的发生是因为黑曜石。黑曜石是一种乌黑发亮的火山玻璃岩,产自单一的矿源——南部土耳其的山区之中,却出现在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对于处在约旦河谷地区的相对依赖燧石工具的人们来说,黑曜石肯定是一种价值更高的物质材料。许多现代的狩猎采集者,比如澳大利亚原住民,都将有光泽的石头视为超自然神力的体现。新石器时代的黑曜石也一定会给当时的先民带来同样的神力联想。薄片的黑曜石是透明的,较厚的黑曜石片可用作镜子。黑曜石还拥有最尖利的锋刃,可以被敲击成为各种复杂的形式。它确实是一种有魔力的物质。”^④

这里的问题是:一种只出产在单一地方的矿石,为什么会出现于所有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呢?答案似乎唯有史前的贸易活动。而当时人交易黑曜石的实际动机,既有实用性的工具制作需要的因素,同时也带有信仰观念方面的驱动因素。不然的话,很难解释当时的各地人群为什么突然之间全都迷上这种黝黑而亮丽的石头。1966年,考古学的国际权威学者伦福儒等发表了他们研究史前黑曜石的有限产地和跨境传播轨迹的报告,题为《黑曜石与近东地区的早期文化接触》^⑤,引起相关领域研究的热切关注,至今仍然是被引用率很高的一篇考古分析文献。在产地和传播的事实得到确认之后,引发出的新探讨方向是:为什么黑曜石能够成为史前巫术信仰的对象?换言之,最初的农业人群的“我为石而狂”心态是如何产生的?对此疑问,就如同后来的金属成为巫术信仰对象的问题一样,可以从“显圣物”的神话观念中寻找解释。将某种非比寻常的物质想象成是天神赐予人间的,初民们不仅将神圣的品性投射给它,还会将一切美好价值附加给它。人类文化中关于“宝”的概念,就这样最初附着在某种特殊的石头上。该石头于是获得神话思维所赋予的超乎寻常的价值,以为其直接来源就是天

①章鸿钊《石雅》新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

②参看张蓓莉主编《系统宝石学》对玉的释义,地质出版社,1997年,第4页。栾秉璩《古玉鉴别》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二章“传统古玉与古玉质鉴别”,第27-86页。

③Pfeiffer, Jhon E. *The Emergence of Man*. London: Cardinal edition, 1973, p.244.

④Mithen, Steven. *After the Ice: A Global Human History 20000—5000B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7.

⑤Renfrew, Colin, Dixon, J. E., and Cann, J. R. 1966. "Obsidian and Early Cultural Contact in the Near East."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32: 1-29.



赐即神赐。如同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经《阿维斯塔》所歌颂的：“呵，阿胡拉！呵，品德高尚，教人从善的塞潘达尔马兹！呵，独具慧眼的（众神灵）！为了庇护我，将你们国家（天国）的无价之宝，如同善良的美德一样，恩赐予我吧！”^①

由这种神赐玉石的信仰，又直接催生出一批神话故事或神话情节，表现在各大文明古国的早期文学和宗教经典之中。犹太教《圣经旧约·创世记》描述耶和华创造的不死仙境伊甸园，就特意用宝玉石作为标记。《创世记》第2章9-12节云：“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②

伊甸园中的神圣性与生命不死性以黄金和宝石为象征，这是西方的铜石并用时代的观念遗产。在东亚神话中，天神赐予的不仅是玉石或宝石，还有可能是玉石制成的器物。黄帝得玄珠（《庄子·天地》）、帝尧得十瑞（《述异记》卷上）、帝舜得玉历（《搜神记》卷八）、禹获赐玄圭（《尚书·禹贡》）等神话叙事，皆为华夏玉教信仰叙事在上古圣王谱系中的特色表现。

作为希伯来文化金玉并重观念之最初源头的还是黑曜石神话观。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在介绍开创农业文明先河的几个重要的西亚史前文化时，列举了三个早期城镇作为个案：杰尔莫、杰里科和萨塔勒·霍郁克。三者的共同点就是作为商品贸易对象的黑曜石资源及以黑曜石加工成的领先性农具。谷物种子、黑曜石成为金属矿物开采和流通之前，率先登上世界贸易舞台的文化元素。“在公元前8000年，粮食文化多半已经确立。难道这是由于杰里科突发性、爆炸性发展的缘故吗？该地区位于海平面以下200多米，与死海毗邻，农业繁荣的条件（具备灌溉条件）并不比巴勒

斯坦其他地方更加理想。不过，聚居地变成了城市，圆形的砖砌、石基房屋非常漂亮；有的房子甚至有好几间。城市四周是壕沟和城墙（带瞭望塔），城内有蓄水池、存放谷物的地窖，城市的严密性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开发利用了死海的盐、硫和沥青，简单地说，就是商业活动得到了初步发展。因为，在公元前9000年，在古老的杰里科村，安纳托利亚黑曜石已经出现；还有软玉和其他火山岩，以及西奈半岛的绿松石和红海的小贝壳。”^③

公元前9000年，当为新石器时代的萌芽期。软玉和绿松石伴随着黑曜石同时出现在全球史上第一批形成的城市聚落。这足以成为唯独中国人爱玉说的古老反证。不过在当时，软玉和绿松石所扮演的文化功能远不如黑曜石。在稍晚于此时期的土耳其，出现了另一个惊人规模的聚落城市，以崇拜女神宗教而著称，名叫加泰土丘，或音译为“萨塔勒·霍郁克”（或“卡托·胡玉克”）。对此，布罗代尔是这样描述的：“由于紧邻两座活火山，萨塔勒·霍郁克几乎垄断了与西方、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以及利凡得的黑曜石贸易，由此获得叙利亚漂亮的燧石、大量地中海的贝壳、各种各样的石材：方解石、大理石、黑质石灰岩等，以及附近山中的赭石、朱砂、天然铜乃至铜矿。所有这一切都为当时已经相当发达的手工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但是，远在此日期（公元前6000年初）之前，所有陪葬的小物品都不禁令人想到当时的手工艺已经相当专业化，诸如数量众多的标枪、长毛和箭头，经过打磨处理的黑曜石镜子，穿孔精致的‘珍珠’（从棕色石头上打凿而成）项链，蓝色磷灰岩或贝壳，黑曜石或钢制垂饰，金属（铜和铅）珠子，骨制、木制和角制容器，做工精细的羊毛织物等。”^④从这些描述中可知，各种金属矿石如何随着黑曜石、软玉、绿松石的开发和贸易而得到认识和开发。

萨塔勒·霍郁克的早期发掘者是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在他的报告中描述：“这个城镇拥有7000人口，始

①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编《阿维斯塔》，元文琪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9页。

② 中国基督教协会印行《新旧约全书》，南京，1982年版，第2页。

③④ 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蒋明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6页，第38-39页。



建于 8000 年前……它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所发现的人类最大的定居点。在该遗址众多的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中,有一幅石器时代的地图,描绘了该城镇。这幅地图绘制于神庙之一的墙壁上。地图前端画出的是该城镇富有特色的房屋建筑。在城镇后面,画的是一座双峰火山的喷发形象,冒着烟和灰。这表现的是一座现实中的火山,从萨塔勒·霍郁克可以看到,虽然现在成了死火山,在新石器时代却是活火山。该火山是黑曜石的主要地方来源。黑曜石是当时人高度需求的工具原料,因为它有极为锋利的切割锋刃。”梅拉特认为,“在新石器时代,这座火山被一种有魔力的辉光(aura)所笼罩,因为黑曜石不仅是大地母亲的一种礼物,而且和火及地下世界密切联系。这样看,这一幅史前火山的图画,不仅记录了一个可观的自然现象,而且记录了一件具有超自然意义的事件。”^①

梅拉特的这种观察和解释,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新石器时代早期留下的珍贵的图像叙事,试图洞察到当时人的神话思维和想象世界。八千年前的城镇地图不仅透露出黑曜石资源的发生地情况,而且还昭示出火山喷发这样的自然现象如何在神话思维中获得超自然的神圣意蕴。这就有效阐明了黑曜石的魔法性价值来源,成为理解玉石神话观发生的一个经典案例。以某种玉石的经营和贸易为特色的早期农业社会之城镇,给文明起源前夕的西亚定居文化之持久性,带来理论思考的余地。在 20 世纪末期进行的后续发掘表明,萨塔勒·霍郁克城镇的建筑至少经历过十二次重建过程,该文化的可持续性长达一千至两千年,和史前东亚地区的仰韶文化一样,寿命远远超过文明史以来的任何一个朝代。如英国人类学家理查德·拉齐利所说:“黑曜石在新石器时代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对这种物质原料的贸易成为一种主要的因素,成为萨塔勒·霍郁克的规模和持久性的重要因素。该城市农业经济的主要来源在于种植小麦和驯化牲畜。在为城镇人口提供肉食方面,对野生动物的狩猎也起着重要作用。这里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镜子,是用磨光的黑曜石

所制成,这一技术代表了手工艺的高度水平,体现着技艺的专业分工。那里的工业行为还有一个特别惊人的例子,那就是墙壁上的绘画,明显模仿纺织的图案。”^②

在西亚,玉石神话加和玉石开采、加工、贸易的经济行为直接导致诸多高文化因素的出现,使得当时的萨塔勒·霍郁克社会有别于一般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群体,成为一个率先走向文明之途的全球性先锋案例。与它相比,后来真正实现从史前到文明之跨越的伟大古文明,如苏美尔、阿卡德和巴比伦、埃及、中国等,无不以某种变化的形式重复、延续和再现着新石器时代以来玉石信仰及神话观。

三、广义玉石神话:与文明伴生的“疯狂石头”

夏鼐先生 1983 年在日本发表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题的讲演,回应国际上有关中国文化来源问题的独立演化派和外来传播论派之争。在讲演结尾部分,夏鼐提示当时所认为的中国文明起源之关键理论问题,即是:“中国文明是否系独立地发展起来的?”^③夏鼐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可称为中国文明独立发生说。与中国大陆学者相对立的观点,是“中国文化西来说”,在西方汉学界流行已久。较晚近的代表,可以举前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他自 1960 年代以来,以俄文发表一系列论著,如《外来影响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等,主张中国文明起源既不完全是西来的,也不完全是本土独立发生的。他认为外来影响占主导地位。他认为旧大陆上的文明发生具有一个总的源头,即西亚的苏美尔文明。通过移民的迁徙和远程贸易等途径,苏美尔文明的要素向四周文化传播,催生出其他古文明。由于东亚的中国文明距离苏美尔最遥远,获得文明要素的传播过程也最漫长,成为旧大陆上最后一个形成的古文明。这乃是文化传播循序渐进的体现。对于瓦西里耶夫的这种观点,我国学界基本上是否认的,所坚持的是独立发生说。夏鼐先生在坚持独立发生说的前提下,也不完全排

①②Richard Rudgley, *The Lost Civilizations of the Stone Age*, the Free Press, 1999, pp. 19-20 p. 20.

③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



斥传播影响说。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独立加传播说”：“我以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来自国外的。但是根据上面所讲的，我们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①

夏鼐考察中国文明起源的视野是国际性的，他基本依据国际学界通用的判断文明产生的三大标志来讨论中国文明问题。这三大标志是城市、青铜器和文字。夏鼐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讲“中国文明起源”，之所以要以殷墟为主要考察对象，就因为它是中国境内唯一同时具备这文明三大要素的最早文化遗址：“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欧洲的远古文化只有爱琴—米诺文化，因为它已有了文字，可以称为‘文明’。此外，欧洲各地的各种史前文化，虽然有的已进入青铜时代，甚至进入铁器时代，但都不称‘文明’。”^②

以文字的有无这条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文明，则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在概括安阳殷墟文化的独有特点时，夏鼐又指出：“除了上述三个文明的普遍性特点以外，殷墟文化还有它的一些自己独有的特点。但是这些并不能作为一般文明的必须具备的标志。殷代玉石的雕刻，尤其是玉器，便是这种特点之一。别的古代文明中，除了中美洲文明之外，都没有玉器，但是它们仍够得上

称为文明。”^③

认为在中国之外，旧大陆上的古文明“都没有玉器”，这是唯独中国人爱玉说的典型表述，显然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玉石雕刻”和“玉器”之类词语，有必要给与严格界定。因为此类词语的狭义理解和广义理解，差异是很大的。如果只将后代中国人熟悉的玉石种类（即软玉、透闪石玉和蛇纹石玉）当做“玉”，将其他美石排除在外，就会遮蔽我们考察文明起源期人类共有的玉石神话观及其史前信仰根源，不利于对文明标准的普遍性认识。晚近的考古发现表明，作为美石的黑曜石，不光出现在旧大陆的西部、北部、南部和中部的史前文化中，在东亚地区也有重要的发现，甚至早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就被史前先民挑选出来用作工具和装饰品的原料。如我国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在吉林省和龙市崇善镇一带发现了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出土大量石制工具，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用黑曜石为材料。鉴于该遗址距离长白山天池不足 100 公里，可推测这里的黑曜石矿来源于当地长白山火山喷发期之遗留物。^④由于后代中国人所熟知的玉石文化以和田玉为核心，旁及境内各地出产的地方玉种，却基本上没有黑曜石和青金石的位置，一般民众对此类石材更缺乏起码的认识，文明起源研究也就大体忽略了这个方面的因素。以今日的国际学术打通视界来看，各大文明古国发生的差异不在于有没有玉石神话和玉石器加工技术，而在于玉石神话是否传承后世，以及玉石器生产所用的材料对象上的差异。归根结底，文明初始之际的玉石信仰具有跨文化和地域的普遍性。而因地域差别而导致被圣化和神话化的玉石种类有很大不同，使得各个文明呈现出玉石器生产的多样化发展情况。在苏美尔、阿卡德和巴比伦、埃及、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等，史前期的黑曜石和文明期的青金石、绿松石等成为同时存在的宝物，受到社会上层的高度推崇和狂热追捧，并由此牵引着对其他美丽的有色矿石——铜、锡、铅、金、银等的神圣化过

①②③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01页，第81页，第90页。

④陈全家、方启等《吉林和龙青头旧石器遗址的新发现及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程 终于将人类自石器时代带入到金属时代。在除中国以外的所有早期文明的文学叙事中，能够和金属之中最贵重者——黄金——相并列的玉石，不外乎青金石和绿松石等少数几个(图3)。青金石无疑是最重要的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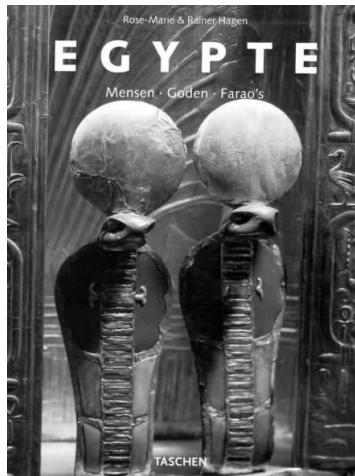


图3 荷兰文版《古埃及》封面标志图。青金石加黄金的圣蛇与日盘雕塑

在号称世界第一部史诗的巴比伦作品《吉尔伽美什》中，第七块泥板第157行讲到天神恩赐给人间国王的三大圣物：“他将给你黑曜石、青金石和黄金！”^①从此类文学表述中，可直观地审视早期文明的玉石神话观，并大致体悟出从黑曜石到青金石，再到稀有金属的圣石依次发生之程序。随着文明的展开，社会的财富观和珍宝观也相应地变化，最早的圣物黑曜石逐渐退出社会意识的聚焦点，使得晚于黑曜石而登场的更稀有的玉石青金石独占鳌头，成为苏美尔文明中唯一获得与黄金等价值的圣物，表现在考古发掘出的该文明顶级文物——宗教艺术品之中。如大英博物馆所藏著名的“乌尔的徽章”(图4)，即用整块青



图4 苏美尔出土青金石徽章图案：国王与献祭礼仪

金石制成。还有苏美尔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乌尔出土的神树和羊雕塑，主体以黄金铸造，用青金石镶嵌为羊角和羊眼(图5)。伴随苏美尔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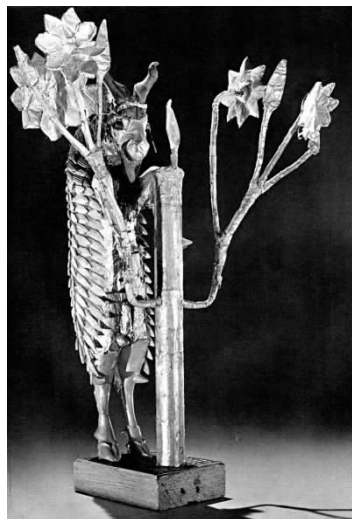


图5 苏美尔的乌尔古城出土神树和羊雕塑。黄金加青金石

对埃及的影响，埃及人同样将青金石和绿松石加以圣化和神话化。从举世闻名的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葬的珍宝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起，以黄金镶嵌青金石和绿松石而制作成的法老像就成为古埃及文明的一种标志性形象，向世人诠释着埃及版的“金玉组合”神话理念。当年制作这件稀世珍宝的古埃及皇家艺术大师还有一个“画龙点睛”之举，即用精细琢磨抛光的上等黑曜石来镶嵌法老面具的眼球(图6)，让这一对法老的眼睛在数千年之后依然显得光彩照人。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那种将玉石器生产看成中国文明独有特点的流行观念，需要做出某种修正。不仅玉器时代说需要国际性的打通视野，文明起源研究也不能无视玉石神话观的作用。不同的玉石生产传统正是有效证明中外文明差异，凸显华夏文明特色的珍贵“物证”。

夏鼐在追溯殷墟文化的源头时也提到二里岗和二里头。不过他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眼界大体限于中原地区。在他逝世之后，有更多更丰富的考古发现相继问世，充分表明中国史前玉石器的生产之源，本不在中原地区，而是最早的西辽河流域的岫岩玉和稍后的中原裴李岗文化的绿松石。至于三千多年前的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出现的绿松石制

夏鼐在追溯殷墟文化的源头时也提到二里岗和二里头。不过他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眼界大体限于中原地区。在他逝世之后，有更多更丰富的考古发现相继问世，充分表明中国史前玉石器的生产之源，本不在中原地区，而是最早的西辽河流域的岫岩玉和稍后的中原裴李岗文化的绿松石。至于三千多年前的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出现的绿松石制

夏鼐在追溯殷墟文化的源头时也提到二里岗和二里头。不过他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眼界大体限于中原地区。在他逝世之后，有更多更丰富的考古发现相继问世，充分表明中国史前玉石器的生产之源，本不在中原地区，而是最早的西辽河流域的岫岩玉和稍后的中原裴李岗文化的绿松石。至于三千多年前的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出现的绿松石制

①George, Andrew. translated, *The Epic of Gilgamesh*,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9, p.59.《吉尔伽美什》赵乐群中译本将“青金石”译为“蓝宝石”，不确切。今据英文本改为“青金石”。



图6 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像及权杖 黄金镶嵌天青石绿松石 眼球为黑曜石



图7 二里头出土神话动物镶嵌绿松石铜牌 首都博物馆早期中国展

作传统(图7),是否可以和七千年前裴李岗文化绿松石器制作传统联系在一起,由于各史前文化间的缺环较大,还不是十分确定的。而自兴隆洼文化玉器生产,经过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继承发展,成为二里头文化玉器生产源头,并经过中原王朝的聚合作用,吸收南方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西部的齐家文化等的玉礼器要素,终于将四方的史前玉文化整合为一体,并一直延续贯穿到夏商周的礼乐制度中,并带来中国式的金玉组合理念(以青铜镶嵌绿松石为主要的器物原型)则是大体上脉络分明的。

四、结语:玉石神话观作为文明起源的动力要素

当代最流行的文学作品《哈利·波特和魔法石》透露出一个信息:有一种被称为魔法石或哲人石的玉石,自史前时代一直到今天,依然代表着典型的西方玉石神话观,并不断催生出无穷无尽的文学灵感与文学想象。根据神话传说,作为珍稀宝石的魔法石是藏在龙脑中的。美国学者戴维·科尔伯特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书中试图解答如下问题:“火龙的脑袋里有什么?”他提示说,除非趁着龙活着的时候取出,才能保持原有的硬度,否则就不是宝石了。于是,此类被称为龙石的魔法石,成为西方文学中检验英雄勇气的试金石。据传是东方的国王就佩戴着这种神奇的白色宝石^①。这里的民间西方文学将中国帝王的和田玉神话与龙神话巧妙地嫁接为一体。火龙脑中有魔法石的故事,构成西方文化对东方龙崇拜与玉崇拜的一种他者化、妖魔化的表现。从文明史发展的分道扬镳情况看,东西方不同的玉石神话自始至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配作用。不过有一点构成各大古文明发生期的共同要素,那就是将某些石头神圣化的玉石神话的信仰和观念。

文学中一切有关宝石的叙事都植根于前文明时代的某种圣化的石头。从文明前夕的疯狂石头黑曜石,到文明中的青金石、绿松石及和田玉,神话化的玉石不仅代表和体现神灵,而且也是永生不死的物质化符号,既能显

^①戴维·科尔伯特《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麦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48-50页。

示圣洁价值也能显现生命的永恒。和寻宝、探宝、夺宝之类的后代文学主题相比,玉石神话观曾经在文明起源期发挥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驱动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支配当时人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和中国的《穆天子传》一样,都描述一位权力在万人之上的国王,不远万里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去求取一种本土所无的玉石。四、五千年前的苏美尔国王希望得到的外贸产品是阿富汗出产的青金石;三千年前的西周帝王周穆王希望得到新疆昆仑山下特产的美玉和田玉。不管二者的差异有多大,玉石神话所驱动的欲望和贸易尝试,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也确实给西亚文明和东亚文明的分别发生带来根本的原动力。这些被当作文学对象的远古作品,需要还原到“神话历史”的真切语境中,重新做出“同情

之理解”和多重证据的验证和考察。这样,在文学表象背后透露出的历史真相,将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今人面前(图8)。



图8 台北故宫藏西汉带皮玉辟邪兽

(上接第30页)强调,与河、洛之数以“5”居中的关系,尤其值得研究。凌家滩玉版纹饰所见方圆八极、天下有中的中极意识,与上古“建中立极”的思想及其与天数“5”的关系,是深入探讨凌家滩玉版与河图、洛书及上古宗教、艺术与宇宙观思想的重要方面。^①

不论是贾湖骨笛、龟铃还是凌家滩玉龟、玉版,都是新石器时代史前艺术的珍品。贾湖骨笛以C为宫的下徵调七声音阶或以D为

宫的六声清商音阶所表现的天籁之音^②,贾湖龟铃与凌家滩玉质龟铃所蕴含的恍恍惚惚的原初三才之象,其飘渺之音,其恍惚之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在宇宙之道,其物在天地之数。史前之数,散在万物;凌家滩玉龟、玉版,其形天圆地方,其数钻孔成图,上承贾湖龟铃余绪,下合河图、洛书点图,阴阳宇宙,仿佛其中。

①这一问题我曾于“清华历史讲坛”以《河图、洛书与文王传“中”》为题作有报告,清华大学,2010年12月8日。相关讨论可以参看小文《〈保训〉之“中”与天数“五”》,《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即出)及《文王演〈周易〉考辨》,《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即出)。

②贾湖骨笛究竟以何音为“宫”,实际上是一个无法真正确定的问题。董忠良先生提出多宫演奏的可能性,见《舞阳贾湖骨笛的音孔设计与宫调特点》,《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3期。